

第十四章

《舊伯仁先生、陳萬華先生訪談錄》

時間：八十二年十二月六日

地點：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一八六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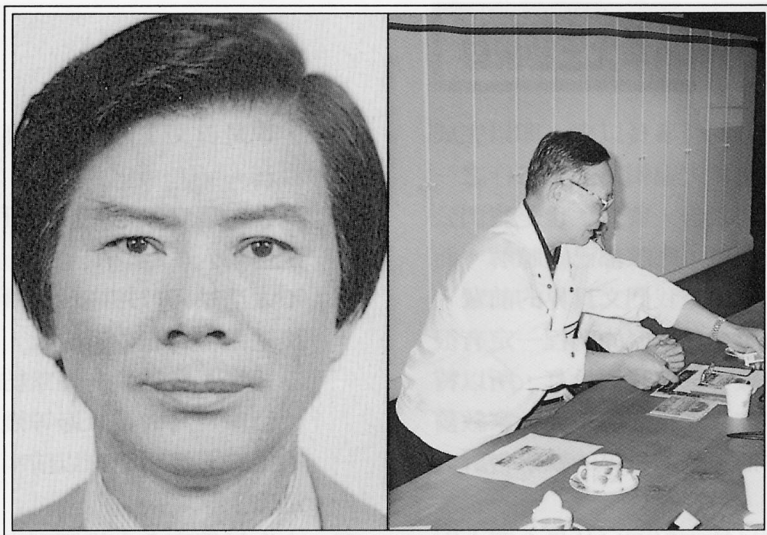
雄獅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工廠

訪談人員：舊伯仁先生（舊）、陳萬華先生（陳）

尹章義教授（尹）、理事長李翊文（理）

雄獅公司總經理張晉嘉

雄獅公司廠長賴重寬（賴）、幹事呂崇誼先生



曹伯仁先生

陳萬華先生

「曹伯仁・陳萬華」

曹伯仁先生，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生於江蘇武進，現為來福文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。曹先生早期曾服務於台灣上海鉛筆廠，對台灣文具工業涉入極早，並參與過文具聯營等工作，對文具發展的瞭解深入，是台灣文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

陳萬華先生，民國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生於台北中和，目前已自文具界退休。陳先生早期是高砂鉛筆株式會社的員工，高砂鉛筆株式會社後為上海鉛筆廠購入改名為台灣上海鉛筆廠，陳萬華先生後轉往雄獅鉛筆廠、燕子文具鉛筆廠、奇美眉筆廠、立達文具廠工作。

曹伯仁、陳萬華先生訪談錄

理：我被選為理事長以來，即以完成台灣文具史編輯為主要工作之一，這些報告，曹先生也是我們公會的理事，應該都已經瞭解。而曹先生也是我們文具界的前輩，對台灣文具發展的過程一定有很多經驗可以與我們分享，所以特別安排今天請您過來與大家敘舊，並把一些文具界的軼事告訴大家。

雄獅鉛筆廠對面以前是台灣上海鉛筆廠，日據時代叫『高砂鉛筆株式會社』，當時兩家工廠面對面的開在一起，是否有其目的？

曹：我從您蒐集到的相片中發現一張台灣上海鉛筆廠的相片，這是非常難得的一張相片。台灣上海鉛筆廠的前身是『高砂鉛筆株式會社』，是一間日本人開設的工廠，但在當初並不是很大，三菱鉛筆、克力（COLLEN）等這些生產規模都較高砂要大。省政府接收高砂鉛筆廠，民國三十五年省府標售，台灣本地的廠商財力並不雄厚，當時有上海鉛筆廠及中國標準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來台灣投標（以上均為大陸工廠），其它地區是否有來競標我不太清楚。最後高砂鉛筆廠由上海鉛筆廠得標。

尹：『高砂』二字是『台灣』的意思

，也是日文『打狗』（高雄）的發音。

理：高砂鉛筆廠股東組成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？

曹：不太清楚。只知道日產事業光復後是由台灣省政府接收。板橋（深丘里）當時還有蓬萊紡織、板橋酒廠及高砂鉛筆廠等幾家較大的工廠。板橋酒廠以前叫『碧山酒廠』。

理：上海鉛筆廠多少錢標到高砂鉛筆廠？

曹：不清楚。

理：高砂鉛筆廠標售後，大陸方面有無派人前來？

曹：從相片中有些人是從大陸派來的，而我當時還沒來工廠。大部份都還沿用當初留下來的人。陳萬華先生他早期曾在高砂鉛筆廠待過。

最初大都是原班人馬，光復時工業原料缺乏，生意只有台灣與大陸間往來，尚未與日本有貿易交易。後來上海鉛筆廠才派技術人員來台灣（約三十六年），但人數不多，約二、三人，我是更晚才來。初期來的是以常州人為主，上海鉛筆廠總公司在上海徐家匯路三二四號，台灣分公司在台北市重慶南路，工廠在板橋市中山路。

理：雄獅鉛筆廠比台灣上海鉛筆廠晚設廠，為什麼會選擇在台灣上海鉛筆廠的對面？

曹：我不清楚，你父親或許有他的考量因素。對交通而言，光復初期，從光復橋過來，板橋中山路很寬敞也很便捷，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。

（編者按：當時板橋工業用地僅雄獅工廠一帶）

賴：台灣上海鉛筆廠以前叫高砂鉛筆廠，後來改名為上海鉛筆廠。當初以賴姓與簡姓員工居多，主管有些是外省人。

理：三星鉛筆廠的由來？

張：產品是三星牌，因此大家便稱它「三星鉛筆廠」，事實上依然是台灣上海鉛筆廠。

曹：當時有三星及五星兩個品牌，後來才把五星改掉。

賴：光復後由台灣上海鉛筆廠負責做筆蕊，雄獅則負責上漆，再送回台灣上海鉛筆廠包裝。月光鉛筆與台灣上海鉛筆廠及雄獅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相互競爭，後來再演變成相互配合。有時交由雄獅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上漆，有時也交由月光公司來負責上漆，不過最後均交給台灣上海鉛筆廠包裝。

曹：這是因為聯營的關係。

理：金福康先生是台灣上海鉛筆廠的負責人嗎？

曹：他是董事長，上海總公司派他來分公司擔任董事長。

理：他原來從事什麼職位？

曹：他在上海總公司沒有職位。

相片中的金博謙是金福康的大兒子。陳萬華先生在我到台灣上海鉛筆廠時便離開鉛筆廠了。當初由大陸派來的人只負責指導工作，主管大都是原班底的人留用，之後技術一直未好轉，總公司才派人來此長駐工廠。

至於為何簡姓及賴姓員工居多，我想是因為過去找工作不容易，同鄉間相互幫忙進入工廠工作的緣故。

理：我在上海一廠遇見一位郭先生，他說台灣鉛筆工業是他帶動起來的。

陳：光復後日本人並未馬上回國，當時我還待在台灣上海鉛筆廠內。政府接收後，日本人仍停留廠內一段時間，直到鉛筆廠被上海鉛筆廠標到後。

曹：大陸總公司的負責人是章偉士先生，董事長兼總經理。副董事長是郭子春（台灣嘉義大林人）。

理：郭先生為何到大陸？

曹：他在日據時代曾到日本三菱鉛筆廠見習、留學。後來回到台灣後

又轉往大陸（日據時代）與章偉士先生合作在上海建立了鉛筆工廠。抗戰時期，配合政府遷往重慶。幾年之後，上海穩定下來，郭子春先生又回到上海並建立了上海鉛筆廠。大陸同胞對當時台灣來的人都非常照顧。章偉士先生是江蘇省武進縣厚餘鎮人，他是什麼機會認識郭子春先生我並不清楚。郭先生負責工廠的生產，也是工程師，工廠內大大小小的事都負責，待人也和善。

理：這樣一來，上海鉛筆廠和台灣的关系非常密切。

曹：說起來是江蘇武進人與台灣嘉義人合辦工廠。三十六年接辦台灣上海鉛筆廠後，郭先生有回來台灣，處理工廠的事情後又返回上海。上海廠的員工有二百多人，規模很大。郭先生當時為處理台灣廠的事情回到台灣，正巧碰上二二八事件，便在事情告一段落後回上海。

林寶誕先生是台灣上海鉛筆廠最初成立時的廠長，後來換成金福康先生。林寶誕先生也是台灣嘉義大林人，是郭子春先生的同鄉。

賴：林先生後來也回到大陸，大概是民國三十八年左右。

曹：林先生在任廠長期間也回過大陸

一趟。

理：中鉛一廠與中鉛二廠的成立先後情形？

曹：中國標準鉛筆廠自大陸淪陷後便改為中鉛一廠；上海鉛筆廠改為中鉛二廠。大陸現在有很多鉛筆廠是從中鉛一、二廠派出去成立的，特別是中鉛二廠。

理：台灣上海鉛筆廠是什麼時候結束的？

曹：民國五十三年。台灣上海鉛筆廠土地賣給厚生化學公司，公司設備讓售給原來的鉛筆廠員工，並成立了新生鉛筆廠，林茂椿先生（郭子春先生的連襟）是董事長，我擔任總經理，生產金象牌鉛筆，廠址在板橋市埔墘（現板橋八德路一帶）。民國六十五年我改組新生鉛筆廠為來福文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。

尹：陳先生何時進入高砂鉛筆廠工作？

陳：光復那一年，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五日至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。

尹：當時廠長是誰？

陳：佐藤先生負責管理，老闆是日本人但不在工廠裡。光復後政府接收鉛筆廠，仍由日本人負責管理。我在東芝公司（松山廠）工作三年，是養成工。光復後才進入高砂鉛筆廠的木工部工作。工廠

當時約六十五人左右，四個部門的主管及主要幹部還是日本人，一年後這些日本人才返國。光復初，工廠生產的鉛筆有三萬簍，比日據時代還多。工廠從日據時代到政府接收及標售給上海鉛筆廠的期間，工廠都沒有停過工，仍繼續生產。

理：當時製鉛筆的木材產自何處？

陳：木材向羅東林場購買，買一些檜木的邊材做鉛筆板。宏泰木業公司林泉先生負責供應我們木材，莊阿嬰先生在林場工作，負責銷售木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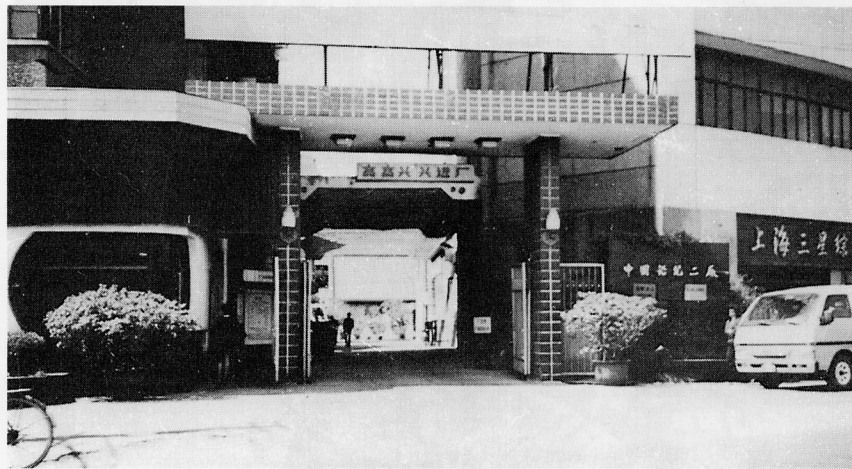
尹：陳先生在台灣上海鉛筆廠工作多久？

陳：高砂鉛筆廠自從被政府接收後，我工作了三年（民國三十八年）離開工廠。民國四十六年我進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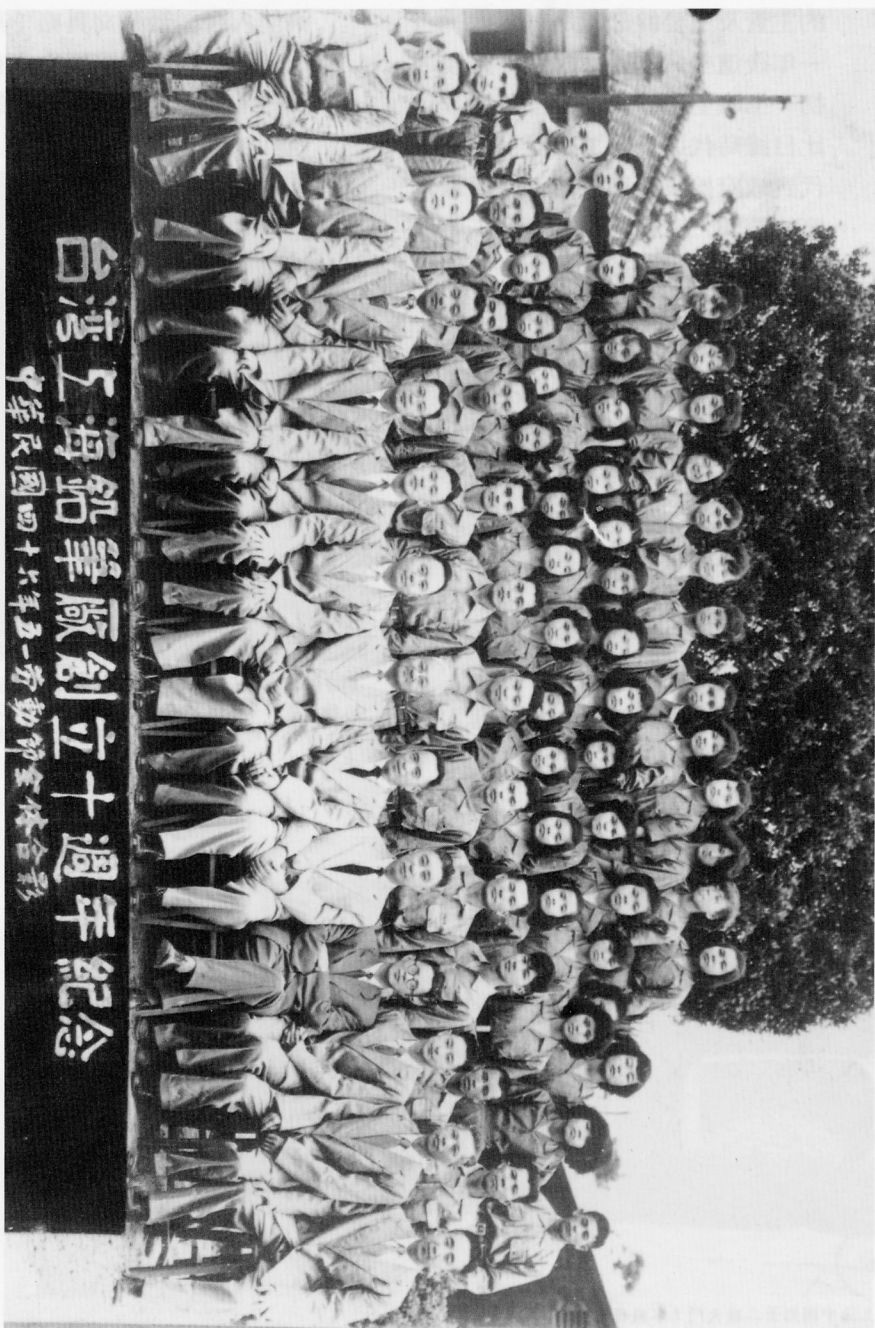
雄獅鉛筆廠工作，五十三年離職與他人合創台灣文具廠（燕子牌）。當時高砂鉛筆廠的貨有回銷到日本，上海鉛筆廠時期的白桿也回銷到大陸。



郭子春先生，台灣嘉義大林人。日據時代由日本至大陸發展鉛筆工業，並因此奠定大陸鉛筆工業的基礎。郭先生對大陸鉛筆工業來說，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。（上海中國鉛筆工廠提供）



上海中國鉛筆二廠大門（本廠現已拆除）
（上海中國鉛筆二廠黃維虎先生提供）



民國四十六年五一勞動節，台灣上海鉛筆廠員工合影於工廠前。前排左一製版組長王華祥先生；左二工務主任趙宣洪先生；左三管理人員許孝榮先生；左四總務主任林茂椿先生；左五會計主動李鴻文先生；左六廠長莊壽雲先生；中坐者為負責人金福康先生，右一為趙廉榮先生；右二會計吳先生（名不詳）；左三為金博謙先生；左四為金先生（名不詳）；左六協理莊厚坤先生。（金樹屏先生提供）

【金樹基先生來函補述】

三星鉛筆廠是於六十年前，民國二十三年時在上海創立，創辦人係江蘇常州的兩位實業家章偉士先生與吳羹梅先生，兩氏原來都是以經營布廠起家，但預見了中國文具市場的潛力，便網羅了留日工程師郭子春先生。郭氏為台灣嘉義大林人，在日本三菱鉛筆廠任工程師，此時投入三星旗下擔任廠長，當時的中國文具市場全被日本貨與德國貨所壟斷，三星鉛筆廠成立之後，才把這份領土逐漸收回。到了抗戰前夕，三星已獨霸中國，另外雖也有兩家小工廠，但都還遠不能與三星分庭抗禮。

三星的組織係屬股份有限公司，由董事會產生總經理，再由總經理選任廠長及各部門主管。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侵華，三星廠由上海經武漢宜昌遷至重慶繼續經營，但華北及東北的廣大市場均在日本勢力範圍籠罩下，無法由重慶運銷，於是在民國二十七年，派遣了部份人員輾轉回到上海，另行成立上海鉛筆廠，兩廠自此成了平行營運的狀況。

戰時的原料取得，上海廠較無問題，仍然可以自東南亞購取木材，重

慶廠則需經香港、越南海防在由滇越鐵路運到雲南昆明，經貴州再運抵重慶，十分困難與迂迴。在經費上兩廠則相反，重慶廠因政府的貸款與資助（當時政府對重要的工業均有支援，以防經濟破產），鉛筆廠為自給自足，並設有附屬之光華油漆廠及鐵工廠，能夠自製油漆及整修機器，除自用外也對外行銷。而上海鉛筆廠則需要在日本人的統治下自求多福，因此兩廠都在慘澹經營中渡過了八年抗戰。抗戰勝利後經濟復甦，上海重慶兩廠都到了供不應求的地步，當時本國之木材均全為整樹材，單價昂貴，於是到了台灣以最高價標下了原為日本人擁有的高砂鉛筆廠（台北板橋），自此便取得便宜的邊材，在板橋廠製成白桿鉛筆，由基隆運至上海加工，使得三星廠的業務如日中天，當時若有外國貴賓訪問上海，鉛筆廠均為重點參觀對象，印度總理尼赫魯便是一例。

如今的上海廠與重慶廠已經行政獨立，重慶廠稱為中國鉛筆一廠，上海鉛筆廠則為中國鉛筆二廠，兩廠均有員工數千人。